

# 《高栢日记》与房良地区的义和团运动

栗景鸿

始发于十九世纪末的义和团运动作为一场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如今已整整过去了一个世纪。其众多可歌可泣的人物事迹至今仍流传于全国各地，影响遍及乡村城镇，被后人所传扬。

房、良地区因地处京畿要地，自然也是当时义和团运动重要的活动区域。据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及《房山县志》等史料记载，当时房、良两地的主要村庄均设有拳厂，民众参加甚广。他们烧符降神，习练武术，以抗御八国联军的入侵。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赵润东、戴家斌两位先生在《房山文史资料》第1、3两辑中分别有专文《房山义和团拾零》和《房山义和团纪略》作了记述。这里再介绍一册记载与房、良地区义和团运动相关的私人日记，作为补充材料，借以丰富一下房、良地区的历史。

这册日记名为《高栢日记》。作者高栢(1852—1904)，字城南，四川泸县人。曾授翰林院编修，旋为山西副考官，河南道监察御使，后转山西道掌印兼署江南、浙江、福建、江西各道御使。历任刑兵工三科给事中。著有《借禅室诗钞》、《高给谏奏稿》等。义和团运动兴起时，高栢正在北京，目睹外军暴行和百姓疾苦，所感所发，汇于笔端，“排日详记成帙”。

《日记》共分八卷，起自庚子年(1900)五月十五日，止于辛丑年(1911)正月十六日，近十万字。高栢去世后，(日记)经其九弟高楷雇八人四日整理抄写完毕，于光绪卅年(1905)排印问世。

《高栢日记》的主要部分记叙了团民活动及八国联军侵入后的北京情况，其中亦间杂有关房山、良乡等地区义和团团民活动的见闻。下面就主要条目略记一二：

(庚子年五月)十九日，于晦若来，示我何润甫涿州来信，十五日发。言去时在良乡，已解散拳民。谓在涑时，杨统领名福同，所带兵皆洋装，误为洋兵，遂与角。杨又开炮，故伤之。涿州拳民四五千，已将解散。后又来山东老团六七千人，似颇有难解之势。何言受国厚恩，尚须费不烂之舌劝解之。谓其吃小米、苦盐，持戒甚严，故无掳掠。语多骑墙，而偏于难解一面。盖亦以为危也。且谓天不雨，恐成流寇。……晦若言，今日九城皆闭片刻。适顺治门闭，虚一缝，许红抹额者入，不许平人入；或恐拳民激怒洋兵，不免有玉石不分之虑。或曰，洋兵来者不过一二千，且广东未见此举，何至施及京城。

刚毅由涿州回至良乡，怂拳。拳谓已见上谕，不敢练。刚曰“上谕不要紧”。未完，送邸钞。上谕以拳匪在内城焚烧杀人，日夜数惊，命九门提督会同神机营、虎神营、武卫军一体严拿。遇有持械喊杀者，即送提督正法……(卷一)

从上面的日记中，可以得知这样一些资料：1900年春夏之交的义和团活动在良乡地区已有相当规模，并与“涿州拳民”、“山东老团”等义和团组织互为呼应，引起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极度恐慌。出于对洋人的畏惧以及清政府屈膝卖国的外交政策，不得不对这场爱国的农民运动进行劝解、解散和镇压。

《日记》中提到的曾来到良乡“怂拳”的刚毅，在当时的清政府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刚毅(1837—1900)，字子良，满洲镶蓝旗人。历任山西、江苏、广东巡抚，光绪二十年(1894)任军机大臣。因其人竭力反对戊戌变法，被慈禧太后委派管理健锐营，为发动政变出力。义和团进逼北京时，刚毅力主招抚。并支持慈禧驱使义和团攻打各国使馆。慈禧曾命他与庄亲王载勋“统率”义和团。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刚毅随慈禧太后西逃，中途病死于山西侯马镇。

作为慈禧太后宠臣，在义和团运动愈来愈盛并开始成为清政府隐患之时，刚毅曾受命与军机大臣兼顺天府尹赵舒翘、督察院左副都御使何乃莹前往涿州、良乡一带察看，企图冒险采取笼络、欺骗手段，通过控制两地的义和团来控制北京的义和团，达到巩固自己统治地位的目的，这就是上面日记中提到的“刚毅由涿州回至良乡”之事。刚毅始到良乡之时，未知清政府已下谕百姓禁止练拳，仍然对拳民以“怂拳”安抚为主。据李文海、林敦奎、林克光所著《义和团运动史事要录》载，刚毅自涿州奏报良乡、涿州义和团情形时，强调两地加入义和团的百姓甚多，“蚩蚩之众，诛不胜诛”，“非推诚布公，剴切晓谕，使之改悔，不能期其相安，断无轻于用剿之理”，可见当时良、涿两地义和团的发展规模。

至于《日记》中所提的清军统领杨福同，也是一位不能不说的人物。赵润东先生在《房山义和团拾零》中已有所涉及：

“(1900年)五月二十二日，义和团在直隶涑水县石亭镇用长矛将清军分统领杨福同扎伤堕马，旋即毙命”，这就是义和团历史上有名的“涑水大捷”。而在这场战斗的参加者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房山地区的义和团团民。

据《要录》载，当时清政府因“近畿一带派出之带勇员弁办理不善，甚至纵容兵勇，以查拿拳匪为名，择肥而噬，勒索乡愚”，谕令裕禄严格约束兵丁，不得“任意株连，借端论索”。但是清兵的劫掠之行，仍然引起了百姓的不满与反抗。于是，涑水石亭村的义和团传帖邀约新城、定兴、容城、房山、涿州、易州等地拳民数千人，先围攻驻村小队清军，待杨福同闻讯率马、步队前来援救时，设伏将杨刺死。刺死杨福同的是涑水义和团首领，一位名叫满立的僧人，后被清军抓获(具体情形在《要录》中有较详细记述)。这是自义和团运动开展以来杀毙清将领之较大事件，引起了清政府极大的震动。

再看《日记》下面几则：

(庚子午八月)十九日，……洋兵大队，鼓乐由彰仪门入者千余，领队者，执良乡某屯义和团旗，又有清道旗一面，复有十余旗，皆大书“义和团”，又有“守望相助”字样；并有拳匪刀矛多件。步队在前，马队在后，炮车夹而行。尾车拴黄牛三、驴一。盖十七晨所出队，由良乡搜剿而回者也。路人云，轰村不少。因十三四土人谣传，拳匪将来恢复，且云团聚在外甚多，故洋兵出而剿之。又活捉拳匪六名，车载而归。(卷二)

(庚子午八月)廿一日，九愚言，德兵向伊子言，良乡之轰，其炮子能穿大树，拳匪当之，纷纷倒地。”(卷二)

(庚子年九月)三十日，黄小霁言洋兵至房山，欲毁城市，马教士力言乡中居民靠此买盐米，一毁则乡民绝食，洋兵乃允。(卷三)

上述三则通过高栢本人的亲见亲闻，给我们提供了一份八国联军入侵我房、良两地，大肆抓捕义和团战士，并到处进行烧杀抢掠的罪行录，读来令人发指。

(庚子年六月)二十日，……张主事来，言房山山中亦吃小米，隔三十里一场，买小菜往返六十里。围山多团，挽出香资至百余金。又言良乡令张君聘终日哭泣，兵差过境，照常价加倍，村民怜其拮据痛哭而与之也，团又阻之曰，此车本团所需。官为劾办，团欲加刃。(卷一)

上面一则前半部所说为当时房良两地百姓、义和团团民各自的生活状况；后面述说了官府与义和团为各自所需而发生的相互摩擦，这则日记较真实反映了当时动荡不安的社会景象。《日记》中所提张君聘实有其人，查《北京市房山区志》可知，张君聘，名琨，江西人，光绪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任良乡知县。

(庚子年八月)十一日，房山知县赵某将拳匪收监，曰“洋人来城，即捆交之”。(卷二)

据《区志》知，文中“赵某”为赵元璋，山阴人，光绪二十五年六月至二十八年八月任房山知县。此条所记“洋人来城，即捆交之”，短短八个字，就活画出一个凶残镇压义和团运动、卑躬屈膝的奴才嘴脸，与上面“欲与洋人决裂”的义和团战士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读来让人义愤填膺。

再看几则：

(庚子年五月)廿二日，黄绍廷来，言必决战。房山北山无米菜，房屋但庙之两寮，皆坏者也。闻仍欲与洋人决裂，并有迎头痛剿之密旨。(卷一)

(庚子年八月)廿四日，拳匪在良乡、黄村一带，洋兵往则散，洋兵走则归，聚而劫村庄，拒官长。张君聘已赴省请兵……(卷二)

哪里有侵略，哪里就有反抗。这是两则直接记述房山地区义和团运动的资料，虽寥寥数语，却给我们描绘了一幅房山人民誓死抵抗外侮的斗争画面。“房屋但庙之两寮，皆坏者也”，应是外敌在房山烧杀抢掠的结果，必然激起房山人民的英勇反抗。“仍欲与洋人决裂，并有迎头痛剿之密旨”，同时采取了“敌来我走，敌走我来”的游击战术，既说明了我抗敌的决心，又说明了房山地区的义和团不是一群乌合之众，而是有着比较严密的组织性。

总的看房、良两地的义和团运动，与其它各地的义和团运动一样，由于没有正确的政治领导和完善的政治纲领，缺乏统一的组织，只是以迷信方式进行自发的抵抗外敌的活动，势必导致这场运动最终的失败。但是，义和团运动表现了房山人民及全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外国侵略者的反抗精神，这种精神会永远成为我们宝贵的财富。

高栢作为一位封建时期的官员，所站的立场必然要以维护其自身利益为出发点，所以《日记》中有不少地方诬蔑义和团运动为“拳匪”、“拳乱”，歪曲了历史事实，但毕竟为我们了解和研究百年前房、良两地的义和团运动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所以特从其中摘抄部分有关房良地区的资料加以简要介绍，并希望引起读者对《高栢日记》这一类私人日记、笔记资料的重视。

参考书目：

- |               |              |
|---------------|--------------|
| 1、《庚子记事》      | 中华书局         |
| 2、《义和团》       | 中华书局         |
| 3、《义和团运动史事要录》 | 李文海、林敦奎、木克光著 |

- 4、《中国历史大事编年》
  - 5、《北京市房山区志》
- (《房山文史资料》第16辑)

北京出版社

北京出版社